

# 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

高逸凡 范金民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太湖流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由以太湖为中心的各水系河流湖泊所组成的一个碟形洼地区域。该区域内部社会文化相近,社会经济连成一体,行政沿革上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对象。但是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习惯以“江南”等同于太湖流域的概念,诚不甚允当。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太湖流域等同的“江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心理上的概念,且开始于近代。以“江南”为名开展研究,容易造成研究范围的混乱。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区划范围上承东汉吴郡,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迄明初乃分属直、浙,时逾1200余年,而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然有其影响力。从“浙西”入手本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更有利于增强学术的严谨性。为使这一观点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浙西”的历史作一番详细的梳理。

**关键词:**太湖流域;浙西;江南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4-0059-10

**The Taihu Lake Basin in the Regional History Study: “Jiangnan” or “West Zhejiang”**

GAO Yi-fan FAN Jin-mi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aihu Lake Basin is a geographical concept; it is a dish-shaped depression consisted of river systems centered on the Taihu Lake. Within this region, there are similar socio-culture, united socio-economy, and a common historical origin both on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e, so historians have tended to see it as an overall regional in their research. But in the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cholars used to the “Jiangnan” and Taihu Lake Basin as the same concept, which is inappropriate. “Jiangnan”, as a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cept, their scopes has never re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aihu Lake Basin. The so-called regional of “Jiangnan”, whose consistent with the Taihu Lake Basin is actually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concep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Research under the title of “Jiangnan” is easy to cause confusion among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contrast, “West Zhejiang”, as an existed administrative concept in the history, the scope of its area which inherited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Wu Prefecture,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Taihu Lake Basin, until its divis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It’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two hundred years, and the traditional “West Zhejiang” concept still had its influe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work we have done suggests that conducted regional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 Zhejiang” should be more conducive to enhance academic rigor. In order to support this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 the history of “West Zhejiang”.

**Key words:** the Taihu Lake Basin; West Zhejiang; Jiangnan

## 一、引言：太湖流域与“江南”、“浙西”

### (一) 太湖流域

太湖流域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太湖水系的集水区。太湖水系,包括太湖湖区、荆溪(南河)水系、洮、滆湖水系、苕溪水系、沿江港浦水系、黄浦、吴淞江水系,沿长江口、杭州湾水系以及江南运河,全流域面积共计 3.66 万平方千米<sup>①</sup>。太湖流域的地理范围西以茅山、界岭、天目山为界,北以长江为界,东至海,南以杭州湾、钱塘江、东天目山为界,从行政区划上包括上海市一个直辖市(不包括崇明县),杭州市一个副省级城市(市区钱塘江西岸部分、余杭区、临安市),镇江市(市区及丹徒区、丹阳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六个地级市。

太湖流域绝大多数地区通行吴语太湖片(北部吴语),内部通话程度较高;镇江市市区通行江淮官话<sup>②</sup>,镇江市丹徒区及丹阳市部分地区则为吴语、江淮官话过渡地区,但这些地区的江淮官话“有相当浓厚的吴语色彩,体现出很多吴语的强烈影响,有的成分可能来源于吴语”<sup>③</sup>,即使是镇江市市区方言中也存在大量的北部吴语词汇<sup>④</sup>。太湖流域内部语言相通,文化风俗相近<sup>⑤</sup>,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就有着自身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进入青铜时代后,这里又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吴越文化是太湖流域文明兴起的起点,太湖流域内部各地至今仍然共享着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在社会经济方面,太湖流域水网密布,有着发达的水路交通体系,形成了一个内部联系密切的完整经济区<sup>⑥</sup>,或谓“经济上的统一体”<sup>⑦</sup>,这在今天“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建设上仍然可见一斑。

太湖流域内部社会文化相近,社会经济连成一体,又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地理区域。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太湖流域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在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大多数学者在为“江南”界定地域范围时也倾向于以太湖流域为准<sup>⑧</sup>。

### (二) “江南”与太湖流域

“江南”首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广义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上海、江西、湖南、浙江全境,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福建省北部等地,亦即全国一级气象地理区中的“江南地区”,江南丘陵也分布于这一范围之内。狭义的江南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岸地区,包括两湖平原的长江以南部分,鄱阳湖平原,以及苏皖沿江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的长江以南部分等地,其范围内多为平原

水乡,江河湖泊密布。在这个意义上说,太湖流域是“江南”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江南”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某些历史时期的政区概念。作为历史概念的“江南”,秦汉时期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唐、宋时期指的是长江以南地区或江南道、江南东西道、江南东西路<sup>⑨</sup>,还可以指李氏江南国;元代后,“江南”从正式行政区划中消失,直至清朝,又有地括今天苏、皖二省的江南省出现,“江南”又开始代指原明代南直隶地区,如“两江总督”、“江南贡院”等;至于近代兴起的,与吴语太湖片区域有着同等意义的“江南”<sup>⑩</sup>,实属文化心理概念上的“江南”,且是后者最晚近的表现形式,下文再做详细论述。总之,所有历史概念上的,尤其是历史行政概念上的“江南”,地理范围都与太湖流域不同,所以,历来人们所使用“江南”一词的含义也并不局限于太湖流域之内。而这也正是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常常苦于“江南”范围的界定,需要耗费大量文字进行辨析的根源所在。当然,一些前辈学者也曾提出“明清时期,甚至两宋时期,‘江南’或狭义的江南地区指的是太湖流域或其核心区域”这样一类观点<sup>⑪</sup>,但究其所据,却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1 册《太湖》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2 页。

②《中国语言地图集》B9《吴语》图幅,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1988 年版,另外宜兴、长兴还分布有一些移民方言岛。

③石汝杰、顾黔:《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④如“囤(藏)”、“笃(~汤)”、“再会”、“作兴”、“结棍(厉害)”、“一塌刮子(全部)”、“神智无知”等。

⑤镇江市市区地当太湖平原门户,历来是军事重地和驻军之所,民风轻悍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内,社会风俗、民间信仰多与苏南相通,可视为太湖流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⑥洪煊春:《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优势和特点》,载《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⑦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 页。

⑧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冯贤亮:《史学与史料: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明清史》2008 年第 4 期。

⑨⑩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 49 辑,1992 年 6 月。

⑪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 49 辑,1992 年 6 月;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文中简称《简论》);冯贤亮:《史学与史料: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明清史》2008 年第 4 期(文中简称《面向》)等。

似乎并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归纳起来,这些分析及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这样几条,并逐条分析:

1. 丘濬:“故韩愈有言曰:‘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sup>①</sup>。——“这五郡相当于今江苏之常州市……,亦即相当于整个太湖流域,也就是最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释江南》)

丘濬所言江南范围明显大于浙东、西,而两浙又大于五府,是五府包含于两浙,两浙包含于江南的关系。且不论这五府与整个太湖流域并不相当,按丘濬之语,也不能推出“狭义的‘江南’=五府=太湖流域”这一结论,只是证明了“五府”是两浙的一部分。

2. 郑晓:“又有江南常、苏、松、嘉、湖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石,”<sup>②</sup>——“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也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面向》)

按郑晓之言,五府只是包含于江南,是江南“的”五府,如果五府等于江南那也就没有必要单独罗列了,应当径称“江南”才是。另外,此言也并没有“论述”江南之意。

3. 顾炎武:“识者谓江南……然其腹心,则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sup>③</sup>——“明后期有人建议把苏南浙西诸府设一行政区置督抚专治,称此地区为‘江南腹心’。”(《简论》、《面向》语类此)

顾炎武所言江南与七府的逻辑关系与上两条江南与五府的相同,只是多了一个“江南腹心”的表述,腹心者,身体之一部也,这一表述反而说明顾炎武并不认为七府是江南的全部。

4. 归有光《寄王太守书》<sup>④</sup>——“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南’,在归有光(1507—1571)看来指的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面向》)

归有光在《寄王太守书》信中,通篇无“江南”、“南直隶”、“浙西”、“苏松常杭嘉湖”字样,惟讲“三江”与开吴淞江之事,不知所谓“江南”的认识是如何依据?

5. 全祖望:“盖会稽之西土自罢侯以来,虽其中离合不一,而苏、松、常、镇之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sup>⑤</sup>——“清代学者进一步指出,苏松常镇‘合于浙西未有异者’,有很强的统一性。”(《面向》)

全祖望所言明确指出苏、松、常、镇历来属于浙西。诸府有“很强的统一性”不假,但却是统一于“浙西”,而没有提到“江南”。

6. 东鲁古狂生:“渡淮到了扬州,过江在镇江,这是江南地方了……先通行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sup>⑥</sup>——“有的甚至表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面向》);“东鲁古狂生的小说,也明确地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就是‘江

南’。”(《简论》)

东鲁古狂生的小说表达了两个意思:一镇江属于“江南地方”;二七府属于江南,所能说明的问题仍与一、二、三条相同,并没有明确地说“七府就是‘江南’”。

7. 《江南催耕课稻编》<sup>⑦</sup>——“林则徐、陶澍、李彦章等江苏最高行政官员,在讨论江南种植早稻问题时,都将‘江南’与‘江北’作出明确区别并进行对比。”(《简论》)

《江南催耕课稻篇》书中所论及的“江南”地方,只包括江苏境内的苏、松、常、镇、太及其属县,显然是就诸人所任官的江苏省内区别对比“江南”、“江北”,不能说明“江南”和太湖流域有什么关系。

综上所述,诸位前辈所列举的论据,至多可以论证“明清时期的‘江南’包含有太湖流域”,却不能推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太湖流域或其核心区域(或‘八府一州’)”这一结论。李伯重也认为“江南”一词,“由于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运用也比较随顺”,“造成了某种的混淆不清”<sup>⑧</sup>。以心中先有之“江南”,而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未免牵强。

最后,江南还是一个文化心理概念。这一概念始于南朝南方文化的空前昌盛,巩固于中唐以后南方,尤其是太湖流域经济的繁荣发展,正因为如此,扬州才能在隋唐以后成为江南文化的代表<sup>⑨</sup>。文化心理上的江南,“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范围”<sup>⑩</sup>,所以必然是变动的,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观的。这个“江南”,可以包括唐代的升州(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可以包括宋代的润州(王安

①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4,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②郑晓:《今言》卷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8《寄王太守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⑤全祖望:《鮑塘亭集外编》卷49,《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页。

⑥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8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⑦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977册。

⑧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⑨⑩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6月。

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还可以包括清代的扬州（纳兰容若《梦江南》：“江南好，佳丽数维扬”），也可以包括南昌、武汉和岳阳（江南三大名楼）；近代以来，“江南”又似乎和吴语区，严格地说是通行吴语太湖片即北部吴语的地区具有了某种同等的意义<sup>①</sup>，应当与这一地区既是传统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最先迈向近代化的因素有关。在“北部吴语 + 经济发达 = 江南”这个最新的等式之下，同属太湖流域的镇江在文化心理上被排除出了“江南”的范围，而被划入了苏南人口中惯称的“江北”。因此，有些学者也受到这一心理的影响，倾向于将镇江从自己笔下的“江南”排除出去<sup>②</sup>。但是，按照同样的等式，经济发达的宁波和越剧之乡绍兴在一般民众心中无疑也被划入了“江南”的范围。故而，这个近代兴起的“江南”概念，地理范围仍不等同于太湖流域或其核心区域。事实上，文化心理上的“江南”，本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在各地作一个调查，询问这样几个问题：“绍兴是不是江南？”“扬州是不是江南？”“徽州是不是江南？”“景德镇是不是江南？”“桃花源是不是江南？”我想，答案大概是千差万别的。

总之，“江南”一词无论是作为自然地理概念、历史概念、行政概念，还是文化心理概念，其范围都与太湖流域或其核心区域不同。在关于太湖流域的区域历史研究中使用“江南”一词，容易造成研究范围的混乱，或是牵扯大量概念上的解释辨析工作，实在未必合适。

### （三）“浙西”与太湖流域

今天的“浙西”，严格说来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概念或地理概念。有时它是浙江省西部地区的代称，指的是淳安县、建德县、衢州市等浙江省西部县市组成的地域<sup>③</sup>，有时它又指的是钱塘江以西的杭嘉湖地区<sup>④</sup>，即历史文化传统上的“浙西”地区。然而，“浙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域和明确的地理概念，所辖范围也并未局限于今浙江省内。全祖望的《浙西分地录》对此叙说地比较全面：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为杭、嘉、湖、宁、绍、台、温、处、金、衢、严十一府，东宽而西迤。其实，自秦置会稽郡以来，皆以江南之苏、松、常、镇四府为西境，直达于大江而止……后汉顺帝永建四年，始分会稽置吴郡，而移会稽之治于山阴，盖唐浙东分道所由起……迨肃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东西道，则西道于升、润、苏、杭、常、湖之外，并领宣、歙、饶、江四州……其后西道卒罢领宣、歙、江、饶，而以睦州属之。东西各领七州……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复合，但不领江宁，盖复古丹阳之旧。南渡后所分军州亦犹旧界也……盖会稽之西土，自罢侯置守以来，虽其中离合不一，而苏、松、常、镇之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若以地势民风言之，则杭州而西，应与苏、松

四府为一部”<sup>⑤</sup>。

从这段叙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几点内容：一地理上的浙西应当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后文还强调严州府“东属者非也”），其地势民风相类（因为同属太湖流域）。二浙西地区专有的行政区划始于东汉吴郡，至唐有“浙西”之名；中唐之后，浙西领地稳定，宋因之，但罢领江宁，领地范围更近东汉吴郡；明初，浙西之地在行政区划上始分属直、浙。三包含苏、松四府的传统“浙西”概念在清代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作为浙东有识之士的全祖望就指出了“浙西”分属两省的不合理之处。可见，传统地理概念上的“浙西”，范围应当是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的，而历史行政概念上的“浙西”，在中唐之后也长期稳定地与太湖流域的地理范围保持着相对统一；在传统的浙西地区分属南直隶和浙江后，包含整个太湖流域的“大浙西”概念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冯贤亮曾指出：“浙西中的湖州与嘉兴，历史上与苏南同属一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直到清代，人们还经常将苏、松归入‘浙西’这个历史性概念加以表述，体现了苏南与浙西在民众心目中的历史统一性。在许多社会问题上，地方官与士绅们是将整个太湖周边的苏南与浙西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或有机体来进行讨论的。”<sup>⑥</sup>其实，杭州在历史上又何尝不是与苏南同属一区的呢？即使是明清以后出现的这个“小浙西”（杭嘉湖），其范围仍然在太湖流域之内。

因此，凡是历史记载中的“浙西”，范围几乎都不会超出太湖流域，且长期与太湖流域保持着相对的统一。相比“江南”，“浙西”在历史上与太湖流域似乎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 二、“浙西”小史

为了进一步明确“江南”与“浙西”的关系，也为本文观点提供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有必要对“浙西”的历

①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6月

②徐茂名：《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郑书逵：《浙西经济明朝更好看》，《上海经济》2004年第1期。

④钱明：《“两浙”地域文化性格差异与当代浙江之发展》，《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3期。

⑤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9，《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821页。

⑥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与水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2010年。

史作一番更加详细的梳理。

### (一)“浙西”的前身：东汉吴郡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发展成为隶属越文化的马桥文化，核心地域都在唐代以后所称的“浙西”地区，其分布范围也与后者基本一致<sup>①</sup>。此后，本地区成为吴越两国和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sup>②</sup>，至楚威王伐越之后，江左浙右之地才尽入于楚<sup>③</sup>。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将王翦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sup>④</sup>，郡治在吴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汉廷分会稽为吴郡<sup>⑤</sup>，唐代文献《吴地记》记载了具体的划分方法：“至汉顺帝永建四年，有山阴县人殷重献策于帝，请分江置两浙，诏司空王褒封从钱唐江中分，向东为会稽郡，向西为吴郡。”<sup>⑥</sup>会稽二分的起因似乎是浙江东侧诸县之人觉得郡治隔江在吴，路途遥远，行事颇为不便<sup>⑦</sup>。联想到楚威王大破越国却也只是“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可见浙江之险诚如钱穆所说，是划分两浙东西的天然界线。东汉吴郡所辖之地有：吴县、曲阿县、丹徒县、毗陵县、阳羨县、无锡县、娄县、海盐县、由拳县、乌程县、余杭县、安县（钱塘县）和富春县<sup>⑧</sup>，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市、苏州市、常州市、镇江市（除句容市）、无锡市、嘉兴市、湖州市（含长兴县、德清县）和杭州市（含临安市、富阳市、桐庐县和建德市）八市地方，这一区域已与后世浙江西道和两浙西路的范围基本相仿<sup>⑨</sup>。其境南抵浙江，西倚江南丘陵，北凭大江，东临沧海，内部则是大片的平原泽国，地势低下，尤以地处中心的太湖和苏州为最。宋人论浙西地势言道：“盖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龙江东入于海。而平江地势，自南自北至常熟县之半，自东止昆山山地西南之半，水与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诸州所聚之水，泛滥其中。平江之地，虽下于诸州，而濒海之地，特高于他处，谓之堠身。堠身之西，又与常州地形相等，东西与北三面，势若盘盂”<sup>⑩</sup>；元人则谓：“今询访得，浙西诸州，平江最为低下，而常、湖等州之水，皆归之太湖，自太湖以导于松江，自松江以注于海。是太湖数州之水所潴，而松江者又太湖之所泄也”<sup>⑪</sup>。可见太湖流域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统一地理区域，而东汉的吴郡和后来的浙江西道、两浙西路在行政区划范围上都与这一地理区域保持了高度的统一，后世的“浙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了东汉吴郡的范围，东汉吴郡是为太湖流域专行行政区划之始。

六朝时期，吴郡相继分划出吴兴郡（吴分吴郡置）、晋陵郡（西晋分吴郡置）、义兴郡（西晋分吴兴郡置）、信义郡（梁分吴郡置）、江阴郡（梁分毗陵郡置）和钱塘郡

（陈分吴兴郡置）<sup>⑫</sup>；此外，永嘉南渡后大量北方侨民迁入东汉吴郡故地，为安置和管理侨民，南朝政府又在原晋陵郡境内设置了南徐州及其所属的许多侨郡（后逐渐实土化），并将东汉时属于吴郡的晋陵郡、义兴郡及其部份属县也划归南徐州及其所属侨郡管辖<sup>⑬</sup>，这就使得东汉吴郡故地内的行政区划一度变得非常复杂。隋灭陈后，形势又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变：南徐州及其所属侨郡、县被废，南东海郡故地及曲阿县并入江都郡；信义郡、吴兴郡废置，其所领县并入吴郡；义兴郡、江阴郡废置，其所领县并入毗陵郡（晋陵郡）<sup>⑭</sup>。至此，除南东海郡故地、曲阿县，以及划入遂安郡的汉富春县故地一部外属之外，东汉吴郡故地主要分属毗陵、吴、余杭（原钱塘）三郡。

### (二)“浙西”的出现与发展：浙江西道与两浙西路

唐贞观元年（627），隋末唐初的混乱局面稍定，易代丧乱时权置之州郡遂“悉令并省”<sup>⑮</sup>，东汉吴郡范围内的行政区划也重新确定下来：在隋时并入江都郡的原南东

①②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66页。

③《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4页。

⑤《后汉书》卷6《孝顺孝冲孝质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7页。

⑥陆广微：《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⑦郇道元、杨守敬等：《水经注疏》卷40：“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之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实际上，分置之前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与阳羡同属浙西，此说似有误，或当为浙东人之请。

⑧《后汉书》志第22《郡国四》，第3489页。

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东汉·扬州刺史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2页。

⑩赵霖：《平江水利策》，转引自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⑪任仁发：《水利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851册，第67页。

⑫《宋书》卷35《州郡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1—1041页；《隋书》卷31《地理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7页。

⑬《宋书》卷35《州郡一》，第1038—1047页。

⑭《隋书》卷31《地理下》，第873、877—878页。

⑮《旧唐书》卷38《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4页。

海郡改置润州,领故属东汉吴郡的丹徒县、曲阿县、延陵县,以及故属汉丹阳郡的句容县、白下县;隋毗陵郡改为常州;隋吴郡改为苏州,分其所领乌程县新置湖州,领武康、长城二县;隋余杭郡改为杭州,诸州同归江南道监察<sup>①</sup>。由此设立的润、常、苏、湖、杭五州,正是日后“浙西”的基本范围。

开元二十一年(733),天下划分十五道,分置采访使如汉刺史,从江南道划分出来的江南东道以苏州为采访使治所<sup>②</sup>。肃宗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都,皆有节度之额,盗寇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sup>③</sup>。于是乾元元年(758),朝廷于江宁置升州和浙江西道节度使,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十州,此后近三十年间,浙江东、西道屡有分合<sup>④</sup>,代宗永泰后,润州“常为浙江西道观察使理所”<sup>⑤</sup>。德宗贞元三年(787),镇海节度使<sup>⑥</sup>、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滉去世,浙江东、西道一分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sup>⑦</sup>,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后亦领镇海军节度<sup>⑧</sup>)“领润、江、常、苏、杭、湖、睦七州”,次年,江州改隶江西观察使<sup>⑨</sup>。至此,浙江西道止领六州:润、常、苏、杭、湖、睦,此后凡称“浙西”之地,其范围基本不再超出这六州之域,一个相对固定的“浙西”概念自此诞生。六州之中,润州及所辖丹徒、丹阳、延陵、金坛四县为东汉吴郡之丹徒、曲阿二县故地,常州及所辖晋陵、武进、江阴、义兴、无锡五县为毗陵、曲阿、阳羨、无锡四县故地,苏州及所辖吴、嘉兴、昆山、常熟、长洲、海盐、华亭七县为吴、由拳、娄三县故地,湖州及所辖乌程、武康、长城、德清四县为乌程、余杭二县故地,杭州及所辖钱塘、盐官、余杭、富阳、新城五县为钱塘、海盐、余杭、富春四县故地,睦州及所领建德、寿昌、桐庐、分水四县皆为富春县故地,而润州所领上元、句容二县,湖州所领安吉县,杭州所领于潜、临安、紫溪、唐山四县,睦州所领清溪<sup>⑩</sup>、遂安二县,皆为汉丹阳郡故地<sup>⑪</sup>。可见浙西六州之地在东汉吴郡故地的基础上,并入了少量汉丹阳郡故地,基本继承了东汉吴郡的格局,仍然与太湖流域的地理范围基本相当<sup>⑫</sup>。太湖流域自三国时吴郡分裂以来,第一次重新实现了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划的相对统一,后世的“浙西”自此正式出现。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九月,钱缪任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使、润州刺史,“移镇海军额于杭州”<sup>⑬</sup>;光化元年(898年)二月,“钱缪请徙镇海军于杭州,从之”<sup>⑭</sup>。于是继苏州、润州之后,杭州也开始成为浙西的军政重地。钱缪以杭州为据点,统率镇海军平定了浙东节度使董昌的叛乱,得授镇海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国,吴王<sup>⑮</sup>,几乎将浙江东、西

二道(除润州、常州和升州外)全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吴越政权。而浙江西道的润、常、升三州则先后属于杨吴和南唐<sup>⑯</sup>,苏、常一带遂常为杨吴、南唐与吴越双方拉锯的战场<sup>⑰</sup>,因此五代时期浙西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sup>⑱</sup>。

北宋一统之后,太宗至道三年(997)开始重新整理天下诸路,定为十五路,合唐浙江东、西道为两浙路,置

①《旧唐书》卷42《地理三》,第1583—1589页。

②③《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385—1389页。

④《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84页、《新唐书》卷68《方镇五》,第1903—1908页。

⑤《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83页。

⑥即镇海军节度使,建中二年(782)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置节度,治润州,赐名镇海军节度,参见《新唐书》卷68《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8页。

⑦《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601—7602页。但《新唐书》载浙西治苏州,与《通鉴》、《元和郡县志》皆异,且《旧唐书》所载各浙西观察使中,仅李涵明为苏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江西道观察使(《代宗本纪》大历七年二月事),《新唐书》此处恐为误。

⑧如韩皋,参见《旧唐书》卷14《宪宗上》,第424页;“乙亥,以兵部尚书李德裕检校右仆射,充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参见《旧唐书》卷17下《文宗下》,第556页。

⑨《新唐书》卷68《方镇五》,第1910页。

⑩原名还淳县,永贞元年(805年)十二月避宪宗讳改为清溪县,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95页。

⑪《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83—1589页、第1594—1595页;《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56—1061页;《宋书》卷35《州郡一》,第1029—1033页、第1039—1041页。

⑫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江南东道》,第51—52页(图中还淳县即清溪县)。

⑬⑭《旧唐书》卷20上《昭宗》,第750页。

⑮《资治通鉴》卷261昭宗光化元年,第8634页。

⑯升州,唐光启三年(887)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复置,参见《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57页。

⑰《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9—751、754—755页;卷62《南唐世家》;卷67《吴越世家》,第843页。

⑱其时杨吴犹以润州刺史领镇海军节度使,权臣徐温曾任其职,其人后又受封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就镇润州,可见在此非常时期内润州依然是浙西的军政重地。参见《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第760页。

安抚、转运二使<sup>①</sup>，下辖润、常、苏、湖、秀<sup>②</sup>、杭、严、越、明、温、台、婺、处、衢十四州。神宗熙宁年间，两浙东、西路屡有分合，至熙宁十年（1077）始复为一<sup>③</sup>。其间熙宁七年（1074），朝廷采纳沈括的奏议，首次将两浙路分置东、西两路，“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舡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远民无所赴诉，近郡困于将迎。欲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从之。”<sup>④</sup>由此可见，地理区域的分隔使得两浙路在治理浙西、浙东各州县的效率上出现明显的不同，浙西杭、苏、湖、润、常、秀六州同属太湖流域，河港密布，舟楫往来便利，睦州虽位于丘陵地带，却与杭州有浙江水路相通，往来亦无大碍；而浙东多为山地，只有明、越两州有少量冲积平原与杭州隔江相望，温、台、处三州更是与杭州遥隔高山大河，官民往来甚为不便。在此情形下，在浙东分设一路，把转运、提举二司设置在交通相对便利的越州，把提点刑狱司设置在南部山区的温州，不失为致治安民的明智选择。而新设的浙西路分别以杭州和润州为三司治所，则应是此二州历来在浙西拥有重要地位的缘故，二州地当运河始终，润州自唐永泰以来便常为浙江西道观察使、镇海军节度使治所，而杭州则一直是吴越国统治浙江东西的军政中心。至于熙宁十年两浙东、西路的复合，大概与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次罢相、变法失败的政局有关。政和三年（1113），润州因曾为徽宗潜邸的缘故升为镇江府<sup>⑤</sup>，苏州也因曾为“徽庙节镇之所”<sup>⑥</sup>升为平江府，浙西遂有两府五州。

建炎南渡后，两浙成为江防和驻蹕要地，高宗建炎三年（1129）二月庚午，“诏平江、镇江府，常、湖、杭、越州，具寓居京朝官已上姓名以备简拔。分命浙西监司等官，募土豪守千秋垂脚襄阳诸岭，以扼宣常诸州险要。”<sup>⑦</sup>于是复分两浙为东西二路，西路辖镇江、平江二府及杭、秀、湖、常、严（宣和三年由睦州改名）五州及江阴一军<sup>⑧</sup>。范围与熙宁七年的浙西路基本相同<sup>⑨</sup>，与唐浙江西道相比，润州之句容、上元二县已于北宋初年重归升州，延陵县并入丹阳县；常州分江阴县置江阴军；平江府析吴县置吴江县<sup>⑩</sup>，析昆山置嘉定县，分华亭、嘉兴、海盐三县置秀州<sup>⑪</sup>；湖州析乌程县置归安县，长城县更名长兴县；杭州析钱塘、盐官、富春三县置仁和县，唐山县更名昌化县，省紫溪县入昌化县；严州清溪县更名淳安县，其余属县相同<sup>⑫</sup>，辖区基本继之而来，甚至更为接近东汉吴郡的辖地范围<sup>⑬</sup>。建炎三年七

月，升杭州为临安府<sup>⑭</sup>，并于绍兴五年（1135）复移浙西安抚使于此，成为一路治所<sup>⑮</sup>。庆元元年（1195）十月，秀州以孝宗出生之地的缘故<sup>⑯</sup>升为嘉兴府。自此两浙西路遂领有四府，又兼行在所在，地位远重诸路，正如范成大所言：“浙西在今实为畿甸，异时遣使（提刑），视他路尤切注意。令陈公以名御史、韩公以左右信臣为之。”<sup>⑰</sup>

在经济上，南宋的两浙西路也是国家命脉所在，“六师百万之命，悉寄东南”，不可稍有疏忽，“自巡幸以来，军储岁计，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产，倍于他郡。”<sup>⑱</sup>。元代任仁发也评论道：“范文正公曰：‘苏之一郡自可岁收数百万石，足为国家粮储，况浙西七郡之广，其为利又不可胜言矣。’愚故知浙西之地，沃壤千里，实天下生民足食之本。其于水利，岂可不尽心致力于斯？”<sup>⑲</sup>。故建炎南渡之后，浙西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1页。

②秀州，吴越王钱元瓘割嘉兴县置，参见《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第741页。

③⑧⑯《宋史》卷88《地理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73—2175、2173—2177、2177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第6175页。

⑤王象之：《舆地纪胜》卷7《两浙西路·镇江府》，《续修四库全书》第584册，第105页。

⑥范成大：《吴郡志》卷1《沿革》，第4页。

⑦⑬《宋史》卷25《高宗二》，第461、467页。

⑨熙宁四年江阴军废为江阴县，隶常州，建炎初复置军，参见《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3—2177页。

⑩后梁开平三年（909）吴越置，参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28页。

⑪同时分嘉兴县西南九乡置崇德县，隶秀州，事在后晋天福四年（939），参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第1913页。

⑫以上对比情况参见《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3—2177页；《旧唐书》卷40《地理三》，第1583—1589页、第1594—1595页；《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56—1061页。

⑬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第59—60页。

⑭浙西安抚司自建炎三年（1129）八月以来一直设于镇江府，参见《宋史》卷25《高宗二》，第467页；《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5页。

⑰范成大：《吴郡志》卷7《官宇》，第3—4页。

⑱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56—957页。

⑲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续修四库全书》第851册，第20页。

地区的水利兴修和农业开发得到了朝廷前所未有的重视,“宋南渡全藉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之米,以为军国之计。当时尽心经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军民,不问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豪富上户箴言不能乱其耳,珍货不能动其心,凡利害之可以兴除者,莫不备举。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乘,悉为膏腴之产。”<sup>①</sup>

在军事防御方面,两浙西路则地当前线要冲。建炎三年,宋廷复移浙西安抚使于临安府的同时,也在镇江设置了沿江安抚使,以镇江知府兼任<sup>②</sup>,负责整治江防,后新任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司公事刘宁止建言:“本府控扼大江,为浙西门户,请拨常州、江阴军及平江之昆山、常熟二县隶属本司,庶防秋之际,沿江一带,号令归一,可以固守”,朝廷从之<sup>③</sup>。肩负着防御大江、拱卫行在重任的两浙西路,可谓有如国门一般。在浙西诸府州中,临安府最南,为路治、行在所在,镇江府最北,为军事要冲、沿江安抚使所在,两府皆凭山临江,又兼运河始终,同为浙西重地。二府之外,平江府自古为会稽、吴郡郡治,地处太湖流域中央,位置在浙西“最为酌中”,又兼国家经济重地,也是浙西的关键之所,知平江府者常兼任浙西要职,如两浙西路兵马钤辖<sup>④</sup>、两浙西路安抚制置使<sup>⑤</sup>、浙西沿海制置使<sup>⑥</sup>、浙西两淮发运使<sup>⑦</sup>、提点浙西刑狱等<sup>⑧</sup>,地位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除临安府为畿甸外,平江府、镇江府、常州等地在《宋史·地理志》中均被列为浙西之望郡<sup>⑨</sup>,可见今天的苏南四市和上海地区在历史上的确是浙西地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的两浙西路,控江湖之要,扼山海之险,将整个太湖流域置于管辖之下,地域范围基本继承唐代的浙江西道,而又远超东汉吴郡之统。在政治地位上,两浙西路又高于历史上的浙江西道和东汉吴郡,成为了国家的畿甸之地。太湖流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也为其在明、清两代经济、文化上所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明清以后浙西地区分属和“浙西”概念的分化

入元后,浙西诸府州大多升为路,与浙东、江东、福建等地并隶江浙行省。但是,元代有一个“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负责监察原两浙西路地区,而元代的肃政廉访司,实际具有凌驾于路府州县之上的监司地位<sup>⑩</sup>。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所辖的路以及与路平级的州有:杭州路(原临安府)、湖州路(原湖州—安吉州<sup>⑪</sup>)、嘉兴路(原嘉兴府)、平江路(原平江府)、常州路(原常州)、镇江路(原镇江府)、建德路(原严州—建德府<sup>⑫</sup>)、松江路(原嘉兴府属地)和江阴州(原江阴军),除元世祖至

元十四年(1277年)分嘉兴路华亭县新置华亭路(后改松江路)外,各路、州辖地基本与宋两浙西路各府、州、军同<sup>⑬</sup>。因此,元代的浙西地区仍然包括整个太湖流域,此时的“浙西”也仍是一个与太湖流域地区有着同等意义的地理概念,而并非如冯贤亮所说,“在宋代以后人们的使用中,本来幅员广阔的‘浙西’出现了收缩”<sup>⑭</sup>。直到元末,朱元璋仍言:“(张士诚)北连两淮,将其强力,数侵吾之疆场。赖诸将连岁征讨,克取两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命卿等讨之。”<sup>⑮</sup>《明太祖实录》还记载道:“是时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湖广,或谓:‘苏湖地肥饶,又逼近金陵,当谋先取。’(刘)基曰:‘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如探囊中物耳。’”<sup>⑯</sup>则可见其时张士诚所据苏州等地仍被视为“浙西”之地。

明朝初年,浙西的行政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元璋建都应天,仿照元朝旧例,将应天及周边大量府、州直隶中书省,包括应天府、凤阳府、寿州、泗州、宿州、亳州、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广德州、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嘉兴府、

①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续修四库全书》第851册,第15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第1447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第1491页。

④如汤东野,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第452页。

⑤如汤东野,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第557页。

⑥如梁汝嘉、仇念,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第2256页。

⑦⑧如吴渊,参见《宋史》卷416《吴渊传》,第12467、12466页。

⑨《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3—2177页。

⑩李治安:《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文史》第52辑,中华书局2000年。

⑪理宗宝庆元年(1225)改湖州为安吉州,参见《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5页。

⑫度宗咸淳元年(1265)升严州为建德府,参见《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7页。

⑬《元史》卷62《地理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91—1496页;《宋史》卷88《地理四》,第2173—2177页。

⑭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与水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2010年。

⑮《明太祖实录》卷21,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1982年版,第296—297页。

⑯《明太祖实录》卷99,第1688页。



湖州府等府和直隶州<sup>①</sup>。其中,凤阳府、寿州、亳州等淮西府州是朱元璋的故乡和“龙兴之地”,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等府州是其大业肇基之地<sup>②</sup>,而淮安、宿州、扬州等淮东之地和苏州、嘉兴、湖州等浙西之地则是原先张士诚的地盘<sup>③</sup>。这种将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与最富庶却又抵抗最激烈的地区统归中央直隶的做法,不得不说是具有很大的私意成份在内。而正是这种君王的私意,最终使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都同处一个行政辖区的太湖流域分属两端,这也是传统浙西地区在统一王朝统治下的第一次分裂<sup>④</sup>: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丁亥,“复以直隶嘉兴、湖州二府隶浙江”<sup>⑤</sup>,自此,原浙西的九个路、州中,镇江、常州(含原江阴州)、苏州、松江属直隶,而嘉兴、湖州、杭州、严州(原建德路)属浙江布政使司<sup>⑥</sup>,也是今天同属太湖流域的苏南四市、上海和杭嘉湖地区分属二省一市格局的滥觞。尽管如此,八府各自的辖地与过去相比却变化不大,所相异者,惟苏州府境内新设太仓州<sup>⑦</sup>,松江府境内新设青浦县<sup>⑧</sup>,江阴州降为县并入常州府,常州府江中沙洲新设靖江县<sup>⑨</sup>,以及嘉兴府境内新设秀水、嘉善、桐乡、平湖四县<sup>⑩</sup>。八府所辖范围仍然延续着唐代浙江西道、宋代两浙西路以来的格局。

随着浙西地区的分属,“浙西”概念也开始出现分化:“但往因两浙有警,各议添设参将一员,浙西参将分守杭嘉湖地方”<sup>⑪</sup>,胡宗宪此处所言“浙西”,仅限于杭嘉湖三府地方,又如郑晓所言:“谓苏松在浙西江北间,以故今春先犯苏松,致使浙西参将卢镗、江北参将解明道,各领兵策应”<sup>⑫</sup>。可见,在明代中期一些人的观念里,苏松一带已经不是浙西的一部份了,这就是今天“杭嘉湖即浙西”(或可称之为“小浙西”)观念的早期形式。

当然,关涉整个太湖流域的传统“大浙西”概念,在明代也仍然存在:

明朝政府沿袭前朝旧例,设置了“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简称“两浙盐运使司”,其下分司中有松江分司,行盐地方包括浙西、浙东在内的两浙地区<sup>⑬</sup>,这就使得与盐政有关的“浙西”有时仍然保持着“大浙西”的概念。

永乐三年(1405年)春夏,“两浙大水,命公(夏原吉)往治……导水入海,水不为患,又奏发粟万余石以赈饥,给牛具种子与民兵,吴人怀之。姚广孝还自浙西,上首询公,广孝曰:‘夏某,古之遗爱也’”<sup>⑭</sup>;“四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时嘉兴、苏、松诸郡频岁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迄无成绩。原吉至浙江,按视、咨访利害,奏言:‘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拯治之法要在浚涤吴淞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上。’从之”<sup>⑮</sup>。上述两条史料记载的是永乐年间夏原吉浙西治水的情况,从中

可见,当时人仍习惯将苏松二府归于“浙西”、“两浙”。

宣德初年,明朝政府曾以苏、松、两浙一并巡抚<sup>⑯</sup>。正统时,周忱“巡抚浙西诸郡,按部至姑苏,寓于宋魏文靖公之鹤山书院。正统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集郡县官僚民庶授以约束”<sup>⑰</sup>。这又是一处提到苏州属于“浙西诸郡”的记载。

成化年间成书的《大学衍义补》载:“故韩愈有言曰:

①嘉兴、湖州皆于太祖丙午年(1366)十一月为府,并入直隶,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改隶浙江,参见《明史》卷44《地理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3—1105页;卷40《地理一》,第910—932页。

②“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参见《明史》卷1《太祖本纪》,第15页。

③《明史》卷1《太祖本纪》,第13—14页。

④此前的分裂分别是南朝时分属南徐州和扬州、十国时分属杨吴、南唐和吴越。

⑤《明太祖实录》卷140,第2201页。

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第49、68—69页。

⑦弘治十年置,析常熟、昆山、嘉定三县地益之,参见《明史》卷40《地理一》,第920页。

⑧嘉靖二十一年(1542)初置,三十二年(1553)废,万历元年(1573)复置,析华亭、上海二县地益之,参见《明史》卷40《地理一》,第921页。

⑨吴元年江阴州降县,成化七年(1471)置靖江县,参见《明史》卷40《地理一》,第922页。

⑩四县皆为宣德五年(1430)置,参见《明史》卷40《地理一》,第1104页。以上变化情况可另参见《元史》卷62《地理五》,第1491—1496页。

⑪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266《胡少保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13页。

⑫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217《郑端简公文集》,第2264页。

⑬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32《盐法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566页。

⑭王鏊:《夏原吉传录》,载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保治》,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此文作者王鏊是苏州东山人,故“吴人”当是指苏州一带兵民。

⑮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13《成祖文皇帝》,明崇祯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⑯《明史》卷159《熊概传》,第4351页。

⑰魏驥:《来鹤楼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卷22《公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sup>①</sup>，是亦以苏、松、常为“两浙”、“浙西”。

弘治年间，丘濬在其奏疏中写道：“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道运，使人习知海道”<sup>②</sup>，其“浙西、东濒海一带”，注为“浙江布政使司和常、苏、松三府”，可见在丘濬的观念中，常州、苏州、松江三府仍然是“浙西”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大明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带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设主事或郎中一员，专管三年更代；正德九年，设郎中一员，专管苏松等府水利；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员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十六年，遣工部尚书一员巡抚应天等府地方，兴修苏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金事听其节制，寻设郎中二员于白茆港吴淞江分理开浚”<sup>③</sup>；“近岁有司不原初意，既与水乡同加耗米，至点均徭，亦不分肥瘠一例出银。查得浙江钱塘县灶户施安、海宁县灶户徐淮清等，各告巡抚都御史彭韶、李嗣致：‘蒙听理，将灶丁全户正粮并折金花银两。钱塘、海宁与华亭、上海同一浙西地也，乞勒所司比照二县事例，将滨海灶丁量为存恤’”<sup>④</sup>。前一条史料提到的“浙西七府”、“苏松等七府”，无疑就是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因为只有这七府才是关乎整个太湖流域水利的，这为我们了解明朝时“大浙西”概念的具体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后一条史料则真实反映了当时太湖流域普通民众心中的“浙西”概念。

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其《度支奏议》中写道：“据复天津，以绝影射夹带之弊：查浙西有苏州浒墅之关，浙东有富阳、桐庐、严州之关，盘验夹带，立法甚善”<sup>⑤</sup>；“宜兴乃浙西行盐首邑，据盐臣看得，宜兴亦季地也”<sup>⑥</sup>。说明，与盐政有关的“浙西”，在当时也是包括原属浙西地区的苏州、宜兴的。陈龙正在《目前桃源》一文中也说：“浙西苏常，出入之咽喉，财货之渊藪”<sup>⑦</sup>，参照前文对郑晓所言“江南”与五府关系的梳理，这里的苏、常，应该也可以理解为包含于“浙西”之内。

由此可见，有明一代，与太湖流域范围相当的传统“大浙西”概念从未消失，其影响力仍然留存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之中。顾炎武在明末甚至提出将苏、松、常、镇与杭、嘉、湖重新划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的建议：“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乃以地本一区，属分直、省、臂、指不应，吭腹不通。莫若合七府属一督抚，驻扎镇江，巡历苏杭……”<sup>⑧</sup>，其还列举了这一地区水陆防务不可分的八条理由，分属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大害三条，认为合七府之地属一督抚，则“地势既专，地利亦尽”。顾炎武之议可谓道破了浙西地区在明代分属

直、浙之弊，代表了当时太湖流域人士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真知灼见。

明清鼎革后，清廷改南直隶为江南省，至此，苏、松、常、镇四府不再是直隶府，浙西七府正式分隶两省。康熙六年（1667），清廷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江苏巡抚驻苏州，今天苏、浙二省的格局由此奠定，以省为界的“下三府”、“小浙西”概念从此进一步发展，直至今日。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浙西”概念在清初还有迹可寻，如土国宝顺治三年（1646）所上的《筹浚三江水利疏》：“臣按疏浚下流，浙西诸郡，苏、松最下”<sup>⑨</sup>。一些记录清初历史的史书也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浙西”概念，如《清史纪事本末》：“（顺治二年冬十月）时浙西义旗四起，苏、松、嘉、湖列营数百，杭州危甚”<sup>⑩</sup>。所以，“浙西的范围十分清楚，就是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从未有争议”<sup>⑪</sup>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看到，直到清代初年，“浙西”的概念仍然可以包括苏、松等地，并不尽等同于杭嘉湖“下三府”地区。

### 三、结语

经过对“浙西”历史的一番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数据如下：范围与太湖流域全境基本相当的“浙西”，其历史延续至少有 707 年（自唐贞元四年至（下转第 126 页）

①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24，第 236 页。

②丘濬：《漕运之宜二》，载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 9《户部二》，第 148 页。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595 册，第 658 页。

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续修四库全书》第 595 册，第 761 页。

⑤毕自严：《题覆边商杨有义条陈疏理两浙盐法疏》，载《度支奏议》山东司卷 5，《续修四库全书》第 488 册，第 20 页。

⑥毕自严：《覆两浙盐院李宗著查奏厘革额引大票疏》，载《度支奏议》山东司卷 6，《续修四库全书》第 488 册，第 108 页。

⑦陈龙正：《目前桃源》，载《几亭外书》卷 2《随处问》，《续修四库全书》第 1133 册，第 276 页。

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上》，《续修四库全书》第 597 册，第 2 页。

⑨贺长龄、魏源等：《皇朝经世文编》卷 113《工政十九·江苏水利下》，载《魏源全集》第 19 册，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289 页。

⑩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 8《明南渡三帝及监国鲁王》，上海书店 1996 年版，第 49 页。

⑪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明清史》2008 年第 4 期。

潮流,为挽家族商业颓局,热衷于投资或投身于近代实业,常旭春担任保晋公司经理近十年,渠本翘创办双福火柴厂、出任保晋公司第一任经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晋商家族成员投资的近代企业多以失败告终,常际春、常立瀛等投资兴办的敦义和蚕桑局、敦睦织布工厂等因家族“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贷款无出,将至停办”<sup>①</sup>,有诸多晋商后人参与的保晋公司因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办;转入政界及近代教育领域的家族成员,虽然不乏如常赞春这样的饱学之士,然由于家族商业破产,失去雄厚的财力支持,所得收入也仅够维持生计,与家族商业兴盛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故近代晋商家族社会地位整体下滑。

### 结语

清代传统社会半封闭的社会流动体系中,由于晋中社会崇商风气浓厚,促使晋商独立经商意识觉醒,晋商家族择业兴趣发生转移,注重商业继承人培养。在家族商业发展平稳期,家族成员通过捐官及结交官员等方式与清政府捆绑在一起,向上流动为绅商一族,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重复父辈的职业经历,家族中经商人比例大于读书科举和从事其它职业的比率。嘉道年间,晋商家族主要经营方式东掌制趋于完善,导致家族未从事商业的子孙或另谋职业,或无所事事、贪图享受。

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原有社会流动体系被打破,晋商家族整体社会地位向下流动。

此时,家庭教育的优势性凸显,疏于家庭教育的晋商家族多由于后代骄奢淫逸或吸食鸦片彻底败落,而重视家庭教育的商人家族,因子辈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天获取社会地位的能力较强,提升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抗风险能力。家族商业虽衰落,但子辈多能转入教育、政界等其他领域,成为新社会的精英力量,从而也较平顺地实现了家族转型,但由于家族商业破产,多数成员经济困顿,家族整体社会地位下降。可见,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的状况是当时社会商人阶层发展状况的反映,一部分商人家族成员转型为社会新阶层,一些家族则作为旧的士绅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历史在继续,曾经辉煌的晋商家族却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本文系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晋商与中俄陆路贸易》(13YJC7902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娟娟(1980 - ),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喜琴(1973 - ),女,山西平遥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郝红暖

<sup>①</sup>《十三世立瀛公行述》,载常赞春:《常氏家乘》卷 6《艺文存(上编)》。

(上接第 68 页)至明弘治八年);范围超出今浙江省杭、嘉、湖三市而包含有太湖流域其他地区的“浙西”,其历史延续至少有 888 年(自唐乾元元年(758)至清顺治三年);范围只相当于太湖流域南部杭嘉湖地区的“浙西”,其历史延续至今至多有 633 年(自明洪武十四年至二零一四年),且至少在前 265 年中,包含有太湖流域其他地区的“浙西”概念是与其共存的。

由此可见,“浙西”自从唐乾元元年(758)诞生以来,一直与太湖流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浙西地区”和“太湖流域”几乎有着同等的意义,史料凡言及“浙西”处,其地殆不出太湖流域范围之外。

所以笔者认为,在进行太湖流域的区域历史研究

时,从“浙西”这一概念出发,应当比划定“江南”更为合理。如此,则可以名正言顺,既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又进一步增强了学术的严谨性。

[本文系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逸凡(1990 - ),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范金民(1955 - ),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郝红暖